

抗联老同志回忆

季青谈抗联为何过界的问题和两次伯力会议

(季青现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这个问题同赵尚志逃跑到苏联有直接关系。东北同苏联有联系是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我们党中央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有代表团，王明、康生他们有时从海参威等地派交通员、巡视员，后又派驻满代表，来来往往是不断的。以吉东为主和苏联发生关系是在一九三八年初。周保中第一次到苏联伯力街。这次去的目的是找中央代表团接关系。但是共产国际的联络员于一九三七年四一五月时回去了，再没有来，后来斯大林交通员也没有了，抗联同中央失去了联系。周保中于三七年来整训第七军，结束以后想同中央接关系。但到苏联要通过第七军同苏军联系。这回周保中要到苏联接关系，七军就选派交通员征求苏联意见，说明我们去找代表团的关系，他们同意了，周保中就过去了，这次过界大概是没有找到关系。后来才知道中央代表团在七·七事变后都撤了。这是头一次同苏联发生关系，在这之前同苏联并无关系。

以后到苏联去起头的是赵尚志，他于一九三八年春三、四月份就跑到苏联。他这次把北满的祁志中、戴洪宾都带过去了，好几百人，是好多好马好枪带过去了。一九三八年是抗日游击运动艰苦阶段的开始，敌人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归屯并户，恢复保甲，同时调动大批兵力，据说关东军当时就有七十万，傅义回忆录说当时有一百万关东军，都集中在下江这一带，日本人想把抗联聚而歼之。在艰难困苦时期，赵尚志跑到苏联去了，直接、间接地给东北游击队以很大影响。有困难，但是头头跑了，司令跑了那还了得？那一年他们损失很大。打垮的、逃跑的，都是

受他的影响。

这就引起了北满党内肃清赵尚志影响的问题。第一次伯力会议不是要肃清左倾吗？北满也搞肃清他的影响。到三八年冬，三九年冬这个时期，苏联扣住了赵尚志审查。后来发现他不是一般的人物，是在东北有名的大人物。以后苏联想要利用他，派他回来，同时给他一个委任，叫东北抗联总司令。苏联人也是头脑他妈简单，他们没想想这个委任谁能接受呢？所以他回来时谁也不理他，谁也不着他的面。接着北满也派去代表到苏联去了。目的是要处理赵尚志问题。到三九年冬，苏联派了交通找周保中，邀请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北满省委那些人谁也治不了赵尚志，还得周保中，没有他不行。周保中就去了，这是三五年冬，周保中去了。这次去主要是解决北满党内派别斗争问题。吉林没有什么。周保中去是在四〇年初，一月份和北面见面，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谈了很长时间。这个赵尚志问题不那么容易解决。不是说说就服的人。开始讨论时由苏联人主持，大家发言进入正规后，就由周保中主持了。北满双方，以赵尚志为一方，冯仲云、李兆麟为一方，从一月下旬到二月初，黑天白天那么讨论。最后赵尚志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议同时形成两个文件。一个是《吉东北满党内问题讨论提纲》；另一个是《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提纲草案》。这两个文件没往下发，掌握在领导手里。黑龙江党史所有，这两个文件他们都应该有。这就是第一次伯力会议。

第二次伯力会议。是一九四〇年冬，苏联又找周保中，又通知北满和我，及第五军，时间不是同时，通知的名义也不一致。他们通知周保中时说，北满三路军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这里，请你快来开会。我得到

的通知是说，你们中央代表来到了伯力，请你们赶快来开会。我们已有好多年没有见到中央代表了，非常渴望找到中央的关系。我见到这个通知，我马上把部队安排了一下就到苏联去了，时间是十二月中旬，那时北满、吉东都在那里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以后周保中到那里，苏联也向他们透露这个意思。想不到隔一个时期他们又“打叭”了，说中央代表来不来不能肯定，又这样推了。至推到第二年二、三月份时才说明不能来了，实际上这次是一个骗术。

当时，苏联唱什么调子呢？他说你们自己在东北打不了日本，还得靠苏联帮助你们打。所以现在做准备，将来咱们共同打。你们游击队在东北活动，造成牺牲，不如变成个部队侦察活动，帮助我们了解敌情。那个时候我们对苏联的这个打算坚决反对。这不是改变我们游击队的性质了么？周保中说这种情况是头朝下脚朝上走路，那样我们就会头朝下，脚朝上走路了。意思是说，我们首先是爱国主义者，站在这个立场上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有了这个爱国主义，才谈得上国际主义。我们可以帮助苏联搞情报，体现国际主义。反过来，你让我们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给苏联当侦探，那不就是倒过来走路了吗？

这个意见，东满是同意的，主要是周保中，南满也拥护，改变游击队的性质不行，我们党是独立的，游击队的性质不能改变。

（南满同志是后到的，是我们的交通员在江沿岸，发现小房的墙上，写有“×年×月×日，金日成到此”的字样，告诉了我，我跟大伙说了，我们向苏联提出来，他们是给要出来的，参加了会。原来他

他们没有接到开会的通知。他们听了情况后，同意我们意见。）这个时候北满他们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他们说现在这个处境如此艰苦，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不行，不干了，表示支持苏联的意见。这样苏联对我们就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对吉东就非常刻薄，对北满则好多了。这个斗争实际上没有什么结果。到了三月份的时候，由苏联远东部队负责人王新林召开一、二次会议，实际上是谈谈东北形势，开了两次座谈会，反正是兜售他的货色。到三月末就这么完了，不了了之，分开了。我又回到南野营。这就是第二次伯力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北满是：李兆麟、冯仲云、金策；吉东：周保中、王德明、李青、柴世荣、崔石泉；南满：金日成、安吉、徐哲，都是朝鲜人。

这次实际上不是一个什么会议，拖拖拉拉拖了一冬，十二月到四月，三个多月。我们都研究好了，赶快回东北。决定都回东北。都安排好了。金日成先出发了，第二个就是我。他四月下旬走的，我五月下旬要走。但一过“五一”，苏联就变了招术，说日苏条约签订了，莫斯科有命令，你们一个也不能回东北，这样我们就和他们吵架，闹也不行。北野营都到了边境，又撤回来了，不让走。那时国际形势紧张，苏德战争要开始，西德把兵力都运到波兰国境。苏联怕日本在东方动手。到八月份，稍微缓和一点。日本在朝鲜半岛撤退了，准备进攻南太平洋。那时日本的形势是北进进攻苏联，南进就是太平洋。这时我们经过交涉，我们可以派小部队过来。这是到四一年八月才可以回东北。他知道。你们回去不要紧，反正你

们的头头在我手里攥着。你还得回来找你的头头，离不开上级。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过苏联，实际上是上了当，不是在东北坚持不了，怕死不起，他们把头头当人质，下面队伍离不开。为什么要过界，就是从这个发展过程来理解。

一九四二年七月时，苏联远东红旗军头头总司令换了，以前司令员是朱可夫，四一年调走了，换了个乌克兰人，叫阿巴纳辛克。他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对我们的策略变了。四二年七月十六日远东军区总司令和政委到北野营和周保中同志谈，把南北野营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旅，叫教导旅，下设四个步兵营，直属两个连，一个炮连，一个交通连。让把回东北的人都回来编在这个旅里，目的是培养干部，将来的任务是打到东北开展游击运动。这个旅的主要干部都是抗联的，付手是苏联人帮助教练，编旅以后党的组织、路线不变，同时不限制你们的独立活动，还加强你的独立活动。

东北党委员会是成立旅以后建立的。十一月份才把我调到北野营回来最晚的是刘惟采，四三年夏季才调回去，可是在东北游击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就在那里坚持有可能的。

南野营是于四〇年冬建立，北野营什么时候建立我不清楚，四二年七月以后合并。北野营人数多，南野营也就是三、四百人的样子。主要是一路军和第五军。北野营是三路军和二路军的，第五军本属于第二路军的，别的军建制都变了，变成支队，第五军始终没有变。野营时部队建制还保持原来的，没有变。南野营有三人团，主要负责人是：我是书记，柴世荣、金日成是委员。

访问时间：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

访问地点：黑龙江人大常委会

参加访问人员：胡淑英、高树桥

整 理：高树桥、胡淑英

访问彭施鲁同志记录

一、北野营的地理位置

周保中、李兆麟等几位领导人，在88旅正式成立前，是住在伯力的。1942年8月成立88旅时，他们就从伯力搬到了北野营。

北野营在伯力东北方向距伯力75公里。（1982年4月22日于保中答复彭施鲁同志说：是东北方向，我记得是这样）。伯力在黑龙江抚远县境对岸，隔江相望，距离不远。过去我以为北野营在伯力南边，最近我查了比较详细的地图才知道，伯力就在我国边境附近。北野营不可能在伯力南面。北野营是在苏联境内的黑龙江的南岸，距黑龙江不到半里路，在一个集体农庄伏雅斯克附近，北面靠黑龙江，野营南面、东面、西面都是森林。

北野营，也叫A野营，南野营叫B野营，南野营在双城子附近，我没有去过。

北野营开始是帐篷，没有房子，从1939年底到1940年初建立北野后才开始建房子。到1942年8月88旅成立前后，北野营的官、兵战士边学习、军训，边生产，建筑营房。直到1945年8月大约建造××间房屋。

二、“8.8”苏联对日宣战前五个月东北党委会的活动问题

至于1945年4月到8月这几个月中间，中共东北党委会的活动和88旅领导层是否开会讨论，研究过备战问题，我的印象很淡薄，但在回国前中共党委员会是开过会的，回国如何开展斗争，如何到57个

点进行工作都是党委会上决定的。

从1945年4月到8月，东北党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以及88旅的备战情况，有三种原因我提供不出更多的情况。一是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楚了；二是当时在苏联88旅也是实行一长制，周保中同志是旅长。许多事情他决定之后开会告诉大家一声就照办，不是象现在的党委会，遇到一些问题发生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几天。所以有些事现在印象不强烈，记不清楚了。三是我当时的地位，许多事情按规定不可能预先知道，如什么时候苏联对日宣战等，我们不可能早知道。周保中本人有可能早知道一些。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苏联对日宣战，什么时候和日本打仗，但有许多现象我们当时看到了，私下有议论，有揣测。回忆当年在“8.8”苏联对日宣战前半年中间，有十多件事情连续发生，我们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有许多征候使我们看到仗是要打的，苏日战争将爆发。

第一件事情是“日苏中立条约”的废除

1945年4月7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正式宣布废除日苏中立条约。莫洛托夫例述了日本破坏中立条约的种种事实，宣布提前一年废除日苏中立条约。按国际法，订立条约一方宣布废除即可终止条约的约束力。这样我们就猜测是不是在一年之内或一年之后苏联要对日宣战？估计苏联对日战争迟早是要打的，但判断不准是在到什么时候打。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认识到苏日战争是要打的。快打仗的心情真是焦急啊！因为我们向往祖国，有光复祖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的迫切愿望，急切需要听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

第二件事情是继苏日中立条约宣布废除之后，又听到我党七大召开的消息。

那时的通讯联络都很困难。苏联曾给周保中同志一台收音机。与中共中央断绝联系后，开始在1937年38年等头些年还可以看到中文报纸，《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巴黎救国时报》都能看到。后来中文报纸很难看到了，苏军的《红星》报也不报导这方面的内容。《真理报》是报导的。周保中同志的收音机对延安的播音收录的效果也很不清楚。延安播音的功率当时也是比较低的。记不清是哪一年，好象有一次政治部把周保中同志的收音机放在露天地，让全野营同志收听，效果很不好，也记不清收听的是什么内容了。周保中同志收到一些延安的消息就对大家讲一讲。对于中共将要召开七大我是在1939年冬，从王鹏口中知道的。王鹏是由山东派到东北抗联的，叫东北党派代表参加中共七大。后来我将王鹏送到周保中那里。1981年10月我到哈尔滨，听陈雷同志讲，王鹏是于克同志从山东派到东北来的。最近于克同志给我来信，也讲是他派王鹏来东北的。

在1945年5月前后，野营中共党委和88旅领导层是否讨论过“七大”会议的内容，是否讨论研究过毛泽东主席在“七大”会议上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否讨论过朱德在七大会上的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我记忆不起来了。“七大”在野营，在88旅中间是知道的。

但到底知道七大的多少消息和内容，我很难回忆起来了。总之，“七大”在野营中间的反映，在我的记中比较淡薄。

第三件是德国宣布投降

德国法西斯1945年5月9日宣布投降，这是继1945年4月莫洛托夫宣布废除日苏中立条约，和继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之后，在野营中间震动最大的一件事情。在这之前的几年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节节胜利，有许多好消息传到野营。1942年1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胜，扭转了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战局。1943年9月意大利莫索里尼投降。1944年6月英、美对德宣战，第二战场开辟，在西方，在东方都传来法西斯失利的消息，但什么时候，苏联对日作战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德国投降，日本又失去了一个同盟军，这些都肯定是对我们有利的。苏联会不会立即对日宣战，大家在猜。

第四件事是苏军军运繁忙。实际上在德国1945年5月9日宣布投降之前，西方战场胜利在望，苏军已经开始把西方战线的兵力大量东运，异常繁忙的日月是4月、5月、6月、7月苏联把在西欧战场上的军用物资，枪、炮弹药，军用物资和大批士兵，从西伯利亚铁路上源源不断的东运到伪满洲国的边界伯力等地区，这对日本来说就是大兵压境，我们耳闻目睹到苏联兵运繁忙的情景，大家议论纷纷这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作为一个抗日联军战士，看到这种即将到来的战斗场面，个个磨拳擦掌，严阵以待，但等一声令下了。

第五件事情是突然派到我们88旅一批苏联军官。这些人是从苏联西方战场调来的，这次他们派到88旅的人，与以前不同，以前在旅、营、连，各级都安排有苏联人，现在派到88旅野营是少量的，不是主

要领导。他们作风比较粗野，因为刚从战场回来，带兵下命令。一句话就决定胜败。他们都是不大讲道理的，常常解下皮带就抢皮带打人。这种情景在我记忆中是非常清楚的。

第六件事情就是88旅突然对官、兵的伙食标准改变了。我们中国人不懂这件事情，但是88旅的官、兵伙食标准改变了，提高了很多，平常的时候我们早饭是没有黄油的，可是突然早饭发黄油，糖的定量也增加了。除此，还发给我们香烟，过去是不发香烟的，还发一定数量的酒。我们对这种突然提高了的待遇是不懂得的，不知所以然，但是苏联的士兵，苏联的军官他们是懂得的。苏联的同志告诉我们这是第二线部队的官兵的伙食标准。第二线的伙食供应标准是苏联远东军对日战场的一种伙食标准。第一线的步兵伙食标准是战场上的标准，这意味着我们是第一线战场的待遇的前夕。这事使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了，时局在急骤变化。苏联对日战争这一仗肯定是要打，我们是多么盼望，希望早些打。什么时候宣布战争是最合适的时间呢。在秋收以后或者是在封江之后，过江容易，诸如此类的军事行动的问题，我们天天议论，探索。谁也猜测不定。苏联的意图谁也弄不清楚，只有等待命令。

第七件事情是苏军特种兵军官找我们核对地图。

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以前，苏联的远东红旗军的特种兵军官，炮兵和坦克兵来到88旅做调查。带着中国地图，找熟悉该地区的抗联领导人和战士核对地图的方位。一个一个人的问，问这问那，问得很详细，问这个道路如何，桥梁如何。他们带地图研究地形情

况。苏联军官找了88旅的很多人谈话，了解那个人在东北哪个地区活动。谁熟悉那里的地理情况他们都详细的询问。苏军向我们作调查这件事，时间是在1945年7月前后。这种军事活动，我们是很敏感的。预测到苏、日战争即将暴发，大家心情愉快，热情接待他们，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详情耐心告诉苏联军官。

第八件事情是在苏联对日宣战前夕，突然从野营调走许多人。调走野营的人回东北搞小部队活动。这是常有的事，而这次调走的人数比过去多。把前后许多事情联系起来看，我们猜测战争即将暴发。

至于苏联在8月9日开战前夕，会不会派出400人—500人的侦察小部队降落在东北各地，估计这完全是可能的。李铭顺、姜德讲他们一个小组4个人，在飞机上最早降落下来。后边还有30个或40个小组。我看这不大可能，那时候还没这么大的飞机能装载100多人。我从伯力飞回佳木斯时是40多人挤在一起乘的是个装货的飞机。

第九件事情就是在宣传上，苏联明显的发生了变化。气氛明显的改变了，在苏联的报刊上，从宣布日苏中立条约废除之后，苏联报纸就进行反日宣传，什么旅顺口日俄战争等，苏联报刊就开始进行历史的苏日战争的教育。现在回忆可以肯定当时苏联是进行苏、日战争的舆论准备。

第十件事情是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的前几天，苏联远东军分区红旗军的领导人列昂诺夫到88旅来了，他是远东军事委员会成员，中将。当时，苏联远东红旗军司令叫布尔卡也夫，是大将。他

们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不多，三个人。在中国就类似政治部的位置。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仅次于司令员的地位。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权力也是比较大的。这个中将显然也是远东军区的决策人之一。

列昂诺夫中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到88旅。我现在估计他是要向周保中同志交底的。至于什么时候苏联向周保中、李兆麟交底。我们是从不得知的。从军事部署的角度看，我认为他们对周保中同志交底也不会太早。可能是在宣战前的半个月，或十几天前的样子向周保中、李兆麟交底。

列昂诺夫中将没找我们谈话，但我知道他来到88旅，来到野营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他没对我们这一层领导人谈话，认为他是为了了解抗联的情况，向周保中交待任务，了解战斗情绪而到88旅来的。

以上十多件事情使我们预感到苏、日战争即将暴发。但是宣战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只有在1945年8月8日宣战之后才知道苏、日战争暴发了。以前只是猜测，没向我们讲任何消息。我们的军事生活，军事训练都是一切正常。如此重大的军事机密也不允许更多人知道。

三、苏对日宣战后周保中同志在野营的动员报告

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周保中同志在8月10日给88旅作了准备军事行动的动员报告题目叫《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寇关东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注1）并有一个简单决定（注2）这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我记忆不起来了，我不能否定，也不能肯定。但如此重大的一个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周

保中做军事动员报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报告和决议周保中回忆录说失落了，88旅的许多同志还可访问回忆这件事情。

注 见1980年黑龙江党史所编《周保中回忆选编》114页。

注：见同上114页。

四、“8.15”之后东北抗联有一次战略方针的大变化

1945年“88”苏联对日宣战之后，在日本投降之前，88旅是准备以88旅的一个旅的建制全部用船从伯力野营所在地输送到佳木斯地区，开辟游击战争重建革命根据地，计划用这一个旅开辟一个军。这是苏联同志和周保中考虑的方案。我记忆中很清楚的是这种船只已经到了北野营附近。野营距黑龙江不到半里路。一眼可望见船只在那里等着。在日寇投降前夕，曾设想作为一个旅的完整建制打回东北重建根据地，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后来由于战争迅速结束，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和抗日联军当机立断，决定把进攻任务改变为接收任务，将战略的进攻任务布署改变为接收任务。因为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规定苏联在三个月后（1945年12月初）必须撤离中国，谁接收东北，国民党接收东北，还是共产党接收东北呢？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一项重大定策。日本帝国主义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后的一周内宣布投降，遂之中共中央及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立即改变战略方针，把作为一个旅的建制反攻东北的计划，改变为划分为57个地区抢占东北，控制东北，夺取中共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胜利果实。

原来作为一个旅的建制打向东北时，全旅人数是1500左右的兵

力。包括苏联那达达族人，和中国华侨参加到野营的全部总人数约千人。当时是4个营，每个营两个连，每个连140人—150人。每个营约300人。4个营1200人。还有交通营。还有炮连。总计1500人是不夸大的。

五、9月3日飞到佳木斯的42个人的情况

我是1945年9月3日从伯力飞回到佳木斯的。回到佳木斯之后，担任苏联红军佳木斯卫戍区付司令，军衔是上尉。那时，我的名字改成王殿林（注）所以人们都叫我王司令。与我一块飞到佳木斯的有40人左右。从佳木斯到各县的同志大都是与我乘这架飞机回来的。留在佳木斯点的有我。还有高家留、秦昌胜、许玉林、张殿甲、刘殿令、王成、杨锡清、刁振贤。韩守仁是后去的。王乃武比我们来的早，我9月3日到佳时，王乃武已到佳。王乃武是与苏联红军一块来的。也可能是在宣战前王乃武降落下来的侦察小部队。

（注：回国前，组织上给抗联战士每人起了假名字，周保中同志叫黄绍元，冯仲云叫张大川。）

佳木斯其他地区的点与我一块来的。依兰县有杨青海（红军城防付司令）郝风武、金玉坤（女）、姜兴州、宋云峰、杨永山。勃利县的曹曙（红军城防付司令）、孙发谦、张镇西。汤原县的宋殿选（红军城防付司令）、王显志、王庆云、王福臣、张跃庆。鹤岗县有张风歧（县红军城防付司令）。宝清县有杨风鸣（县红军城防付司令）刘风文。（宝清点的李铭顺，周淑令不是与我一块飞回来的。他们是

单独从苏联到宝清的)。方正县有武昌文(县红军城防付司令)付国增、通河县卢连峰(县红军城防付司令)聂景心、李景荫。富锦县有刘雁来(县红军城防付司令)王玉春、李俊、赵才、兰继丹、佟海泉、崔振山、魏振江。佳木斯地区就这9个点，没派人去的县有同江县、抚远县、绕河县、虎林县、集贤县、罗北县、绥滨县、密山县，因为那是边界，又临近苏联所以没派人去。

从野营分赴各地区是都有名单的。周保中同志他在野营主阵指挥，哪天谁走到哪个地区。周保中同志日记上讲他自己是9月7日飞到长春，这可能是最后一批离开苏联的。

我去佳木斯之前在伯力就定下来担任佳木斯苏联红军卫戍区司令部付司令。其他人是到佳木斯后安排的，如高家留被分配到分局当付局长，其他有些人还是当战士，也没分什么官职，而有的安排回家了。如张殿甲、刘殿林、姜春祥，因为他们年令大了，残废，在苏联时周保中同志有话，就送他们回农村去了。

我们来时，所有的人都是身穿苏联红军军服，有军衔肩章，以苏军面目出现。

为什么以苏军面目出现呢？不以苏军面目出现还是不好出面的。在回来之前周保中就给我们讲啦，我们回到东北要找地下党，找过去抗联散失了的那许多同志，我们以苏联红军的身份出现，在公开场合露面，地下党和失散了的抗联战士很快会找我们来的。否则，我们还很难找他们。事实上我们在1945年9月一回到佳木斯，一公开身份后就有

不少地下党员。和散失的抗联战士找上来。如兴山（现在的鹤岗）有个叫刘银喜的，他马上拿了一个证件，说是取联系的暗号来找我。他自称是由河北省党派他到鹤岗煤矿工作的，后来给苏联做情报工作，他并有电台。“8.15”后他去兴山立即组织起来一支200人到300人的队伍。（他在1947年整党时自杀了）。

还有一个叫井田的，也叫井惠民，在佳木斯住。我一到佳木斯公开以苏军付司令出现后，他就找我了。他自称是从山东跑过来的，山东大扫荡呆不住过来的，后来又给苏联做情报工作，也有电台。这人后来在鹤立做了我们的县长，文化大革命整他被整死了。

我们以红军的身份出现，很自然就亮出了共产党的牌子。目标显赫，很自然就把革命力量吸收到我们一边。

为了适应以苏军军官的身份出现，在苏联回国前，还提了一批军官的军衔。有的原来是上士或司务长的，一下子提为尉级军衔。提了一大批，授衔不少。

六、关于“七月会议”和“八项决议”问题

中央东北党委员会有没有在1945年7月召开党委员会，并有八项决议这件事情我是记不得了。也可能周保中、李兆麟同志他们决定后没传到我们这一级，但回国前有些事情是向我们讲啦，有些事情是曾发生过。回国前可以肯定是召开中共党委员会的，正个任务是回国前的党委会上决定的。但7月还没打仗，7月开没开会记不准了。开会也是周保中、李兆麟，还有苏联旅长决议一下告诉我们一声就完